

中国当代人口问题（二）

张俊杰 主编



## 目 录

出生性别比失调 20 年与人口控制中的若干问题 .....	1
企业男女领导者优势有别 .....	14
低收入人士住房政策国际比较 .....	20
民工不足问题 .....	34
“民工荒”引发人力资源战略思考 .....	42
十三亿人口的能源经济学分析 .....	50
人格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之根本需六大转变 .....	54
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考察 .....	55
世博会对上海人口发展的影响 .....	64
中国社会结构优化问题 .....	70
生育中的性别偏好 .....	72
可供借鉴的外国养老保险模式 .....	76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人口 .....	91
从“五普”数据看我国劳动力流动 .....	98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并非城市化率低 .....	102
北京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的调查 .....	114
农村流动人口教育 .....	126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 .....	131

## 出生性别比失调 20 年与人口控制中的若干问题

1955 年 10 月,联合国出版物公示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域为 102-107,即一定时期内的人口,在无人为干扰胎儿性别及出生时刻有足够量活产婴儿的条件下,每出生 100 女婴相对出生 102-107 男婴。出生时男婴略多于女婴,是对始于出生性别比的分年龄性别比逐龄有所降低,提前自然做出的性别平衡性补偿。出生性别比创新成果表明:出生性别比失调必是人为干扰胎儿性别所致,否则,无论其值是大于 107 还是小于 102 均都属正常。在出生率变动不大条件下,持续重度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将在其婚配期内酿成女性人数的大量短缺,危及人口安全。这无论是从以人为本、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方面考虑,还是从影响未来家庭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方面考虑,都是万不可掉以轻心的一大问题。

### 一、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的决策失误代价

多数家庭非要生有一个男孩的性别偏好,一直是我国广大农村实施计划生育的难点,其由来已久,本质是发展问题。受有形与无形、内在与外在的部分相关传统文化影响,受所在地区人口祖辈居住地相对稳定,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之社会保障制度只是在少数发达农村地区刚刚起步,全面建立、健全还尚需时日。因此,农村中多数只生有女孩的一孩与部分二孩家庭,总是千方百计要再生一个男孩。这种生男偏好,决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认识问题。认识问题可通过宣传教育解决,实际困难则需解决其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

讲科学须二者兼顾，即只有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才能在积极改善男女性别角色差异、更新观念的同时，不断有效地根治男性偏好产生的土壤。然而，这决非是在短期内所能奏效的。

在无检测与影响胎儿性别的现代科技条件下，生男偏好再强也只不过是个偏好问题。胎儿的性别既不会因此而改变，出生性别比也不会因此而失调。所谓旧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主要是一些西方学者把那时数量颇大的溺女婴，以及低年龄死亡概率女性超常高于男性，所导致的低年龄性别比失常，误近似成了相应历年出生性别比。须知溺婴无一不是在出生时刻之后，当见到婴儿性别是女性才溺的，而未溺前的女婴即溺掉的女婴，本应计入却未计入出生性别比统计。因此，所谓溺女婴酿成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完全是对出生性别比概念本义的混淆与背离。

正是源于没从理念上纠正此误，一直把溺女婴作为旧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成因的西方学者，近期才故技重演。老调重弹地称：是计划生育诱使旧中国溺女婴陋习死灰复燃，进而把出生性别比失调强加于计划生育。

20世纪80年代至今，受人口控制及其形成的年龄结构影响，年出生人口从1.6千万左右降至1.1千万左右。与之相比的个别溺女婴现象，其量微乎其微，在出生性别比统计中可完全忽略不计。无庸讳言，溺女婴属侵犯人权。然而，把部分孕妇采用科技手段，人为干扰胎儿性别致成的出生性别比失调，误为是溺女婴导致，毫无疑问，在科学上是荒谬的，在政治上是荒唐的。

1988年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的全国1980-1986年历年出生性别比，分别为107.27、107.01、

107.19、107.80、108.32、111.15 和 112.15。原判定失调的 1980-1983 年历年出生性别比，根据出生性别比新理论本属正常。因此，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失调是始于 1984 年，主要成因是部分孕妇在做了胎儿性别鉴定后流产了本应出生的女胎。此结论还可从相关 B 超仪引进时间及累积数量为佐证。

1992 年，绝大多数国内学者都将人口普查的 1989 年出生性别比 111.92 的失调成因，误归咎于主要是瞒漏报女婴，从而把严重的失调实质否定而变成了统计不实问题。因此，对当时已持续了 9 年之久的出生性别比失调，既未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引起足够重视、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也未采取得力措施加以监管。最终铸成了出生性别比失调此后逐年持续加剧的历史性失误。

## 二、紧缩政策与低生育水平付出的高昂代价

1970 年，全国城乡开始普遍实施计划生育。虽然执行的是从紧从严的“晚、稀、少”政策，但因其是来自亿万群众实践，故“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短短 10 年后的 1980 年，就在约占人口 80% 的农村，当所生第一孩还有 49.17% 未达晚育，所生第二孩还有 82.75% 未达间隔年限或规定年龄时，反映初步成效的总和生育率，即妇女平均终身可能生育子女数，全国就从 1970 年的 5.71 降至 1980 年的 2.24，创造了世界近代人口史上生育率下降的奇迹。同期的城镇从 3.27 降至 1.13，农村从 6.38 降至 2.49。无疑，人口控制的成效对当时及后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1979 年，若不刮紧缩政策风，1980 年全国生育水平必降至更替水平或以下。须强调指出的是：生育水平城镇降至只生一个孩子，农村降至远不足三个孩子且第

三孩又处在急剧下降通道中，都是在政策允许计划生育二个孩子条件下实现的。

1980年初始后不久，在“晚、稀、少”政策远还没有完成其使命的条件下，把人口控制视作机械控制，把人口问题视作数学问题的简单百年人口预测报告主导思想干扰，而急于求成地将“提倡”只生一个，紧缩成“只能”生一个。这种既不搞试点，又不征求群众意见，更不考虑是否可行的主观强迫客观就范，使计划生育在农村失去了多数群众的真心拥护与自觉行动，从而遇到了空前未有的阻力，造成了国内外的长期负面影响。尽管行政手段大大加强，人财物耗费巨幅增多，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受损，但其结果非但没能将生育水平紧缩下来，反而却引发了下降的生育水平，以及峰值生育年龄段恰处出生低谷而理应下降的出生率，都在1981-1982年产生了报复性地大幅反弹。此间的总和生育率，全国回升为2.63和2.86，农村回升为2.93和3.20，城镇回升为1.40和1.58；此间的出生率，全国从1980年的18.21‰回升为20.91‰和22.61‰；第一二孩平均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反映人口控制潜能的生育模式也远不及1980年，其峰值生育年龄段，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从1980年的25-29岁前移至1983年的20-24岁。人口增速如此显著地加快，使我国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在1986年到来。从此，为了年人口计划的达标，统计中的“水分”，便成了人为筹码与公开秘密。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

事实雄辩地说明：政策执行效果，决非是政策允许生一则生二，允许生二则生三的如此简单顺序关系。当

然,这并不排除少数人中存在的允许生二则生三的问题,但作为政策必须从大多数人的可接受程度出发。只有这样,才能限制住少数人的计划外生育,获取整体控制的最佳效果。

生育率从本应下降逆转为大幅回升,其升降之差惊人,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虽然此间农村基层干部的主要精力,至少有一半用于计划生育,但也是事倍功半。因此,计划生育被冠以了“天下第一难”之称。科学与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只有适应才能加强。离开适应,愈加强,愈适得其反。

相对“只准”生一孩来说,始于1984年的完善政策,虽使政策的可行性大为改善,但多数农村地区的政策偏紧问题仍未根本解决,突击式的工作仍难以摆脱。总和生育率受其指标的局限及突击式工作带来的寅吃卯粮滞后反映,虽在1983-1990年间呈升降交替变动,但实际生育水平却无明显下降。然而,在那些凡经批准又恢复执行“晚、稀、少”政策的农村,其生育水平及相关指标,不仅迅速恢复到1980年水平而且还都创出历史新低,且出生性别比也从未发生过异常,可谓了事半功倍效果。值得重视的是,与之相比的所在地区大多数农村都大不如其实效。这充分证实了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一文中的科学论断:“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958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60年代初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计划生育中的紧缩政策及其后果与之是何等的相似!

人口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是一重要国力因素,但不是

决定因素。发展的后劲大小，取决于其素质而非数量。因此，在人口过多矛盾长期存在的历史时期，只有逐步提高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意识，才能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把重点转移到提高人口素质上来。只有这样，大多数农村地区的生育性别偏好才能逐步转变，一个实现了人口转变的人口数量大国，才能加速转化为素质优势的人力资本大国。人口控制再从严，其政策也须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建立在历经教育，绝大多数群众都能接受的宽严适度、长期稳定基础上。否则，一味只强调人多由“口”带来的消极一面，而忽视了人口控制下充分调动现人多由“手和脑”带来的积极一面，那就不是科学的人口观，就易滋生偏颇的不顾及可行性的生育率越低越好，导致人口控制中的“大跃进”问题。

在多数农村地区生育政策偏紧，人口计划又难以完成的双重矛盾中，1991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从实际人口控制能力出发，以远宽松于生育政策限定的出生人口量，求实地调整了上个世纪末人口控制目标，并强调指出这是须尽最大努力才能完成的计划。显然，这是一件颇具求实意义的决策。若以此来判定，其之前所谓未完成的人口计划也都完成。随着人口计划可行性问题的解决，农村生育政策偏紧问题则凸显出来。鉴于逐级考核指标定为是人口计划，而政策落实程度不在考核之内，因此，计划与政策的矛盾初步得以解决。

然而，调整人口计划的实质及其与政策的关系并未被逐级所认识。具体落实到农村家庭的出生计划，因还是以偏紧的生育政策为准绳，尤其在省级以下又普遍存在着计划下达不合理及非科学的层层考核、评比、排队。

因此，在偏颇的生育率越低越好影响下，逐级出于政绩考虑，仍是以政策规定为尺度，有组织地在统计中普遍“注水”，使虚报的计划完成情况与政策限定的出生计划颇为近似，从而把本应尽最大努力才能完成的年人口计划，竟“大有余地”的轻松完成。其“水分”之大，使出生高峰期间理应出现的高峰，在峰值年份也未见踪影。明明是虚假数字过分夸大成绩时期，却硬称是实施计划生育最好时期，着实令人大惑不解。受此影响，2000年人口普查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其低年龄人口与国家教委统计的相应小学入学人数差异之大，足以证实普查漏报的计量单位要以千万计。这无疑为后来工作的进取提出一大难题。

始于1984年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在持续了数年的缓慢加重而达一定严重程度后，生育水平才略显下降端倪。随着人为干扰胎儿性别数量的加速上升与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加剧，生育水平才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起，较其之前有了明显的下降。出生性别比失调成因，虽不能说唯一是，但可以肯定地说，最基本是以检测胎儿性别为手段，以流产女胎为代价导致的。部分农村家庭就是靠流产女胎保留男胎，在达到生一个男孩目的后才终止的生育。随着B超仪的日趋增多及检测胎儿性别的逐步蔓延，流产女胎也呈加速度增长，从而使本应出生的女婴比重偏低问题日趋加重。这既是生育水平在1984-1990年的前期呈波幅变小，末期呈略微下降的主要成因；也是1991-2004年间，出生性别比失调呈急剧加重，生育水平呈明显下降的主要成因。至于极少数农村家庭为达到生一个男孩目的，采用“游击”方式生育的女孩之多，虽令人吃惊，但对整体生育水平来说却可忽略不计。据

分析,以出生性别比高度失调为代价的 2000 年全国妇女平均终身生育子女数,估计约为 1.8-2.0。

若把对孕妇实施全程跟踪监控服务,作为解决胎儿性别选择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计划生育不仅是控制人口总量与调整分年龄人口的阀门,而且也是扭转出生性别比失调与调整人口性别结构的阀门。

近年的农村社会调查显示:虽然要生有一个男孩家庭的比例仍十分突出,但是要生有一男一女的家庭却占绝大多数。囿于多数农村地区的生育政策是,第一胎生了女孩的夫妻可允许计划生第二孩,因此,第一胎做性别检测的很少。即使第一胎性别检测为女,大多数也是生下这个女孩并如实申报,但所生第二孩却要等到胎儿直至检测为男性时才生;囿于政策不允许第一胎生男孩的夫妻生第二孩,部分家庭为再生一个,要么是将男婴误报为女婴,要么是瞒报出生。少数所生两孩及以上都为女性的家庭,为了生一男孩,往往一直是瞒报出生逃避处罚。足见人为胎儿性别选择,既是致成第二孩及其以上分孩次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并随孩次升高而升高的成因,也是远高于第一孩出生性别比的成因。分析与近期的调查均表明:瞒报的男婴要多于女婴,甚至女婴还有可能多报,否则,就不合逻辑。因此,实际出生性别比及低年龄性别比,只可能比 1990 年和 2000 年人口普查的结果高。

2000 年人口普查的全国低年龄性别比,随时间推移,从 10 岁的 111.39 至 1 岁的 122.65,呈逐龄持续显著上升态势。据此可以推断:一是 1990-1999 年的历年出生性别比失调呈逐年加剧态势;二是 2000 年普查时的出生性别比 116.86,因大幅低于 1 岁性别比 5.79 个点而

与变动态势不符，合乎逻辑的是其最低也要等于或大于 1 岁性别比 122.65, 据此推算，至少要有 30.28% 的孕妇做过胎儿性别检测；三是 2000 年普查时的全国分市、镇、县出生性别比，同理，最低也要等于或大于各自 1 岁性别比 114.95、121.42 和 125.49, 据此推算，分别至少要有 15.38%、27.90% 和 35.70% 的孕妇做过胎儿性别检测。须强调指出的是，在男性偏好相当微弱或基本消失的大城市城区，出生性别比就从未发生过失调。

近期，对以持续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为代价或为主要成因，所获得的低生育水平，务必要认识到：这一代价既是酿成新人口问题及相关社会问题的危险信号和警钟，也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规律认识还不够充分，以及多数农村地区生育政策偏紧等问题仍未解决的反映。

### 三、出生性别比失调下的婚配年龄性别比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的低年龄分性别死亡水平已降至相当低且变动又小，通常可用分年龄性别比来近似相应年份出生性别比。此间因历年出生率波幅较大，所生成的分年龄人口差异也较大，因此，即使历年出生性别比有一定程度的失调，但在现婚龄差条件下，婚配年龄间的男女绝对数差异，对婚配年龄性别比恰好起平衡调节作用。因此，20 世纪 80 年代中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及其失调程度，根本不足以导致其婚配年龄性别比失调。须知出生性别比与婚配年龄性别比是不同的概念，出生性别比失调并不等于其婚配年龄性别比也失调。婚配年龄性别比正常与否，关键取决于婚配年龄区间总男女人口数是否匹配。

若历年出生率波幅较小，其生成的分年龄人口差异也较小，而分年龄人口间的男女绝对数差异，因不足以

对出生性别比失调所形成的婚配年龄性别比失调起平衡调节作用,所以,在出生率平稳或变动较小条件下,出生性别比失调则决定了其婚配年龄性别比失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年出生率波幅较小,出生性别比失调成因决策上的失误,既使其后的出生性别比失调进一步加剧,也使约在2010年后开始显现的婚配年龄性别比失调逐年加重,并还可能由此引发出一系列不可低估的社会问题。当然,对持续的出生性别比失调纠正得越早,未来相应所受其害的持续时间及所付代价也少,反之就多。

若以人口出生性别比上限为标准,以1990年人口普查的低年龄性别比为依据,就可留有余地的推算出1984-1990年,因胎儿性别选择流产的女胎,将导致至少短缺女婴200多万。

若按推断的2000年人口普查时全国最低人口出生性别比及其余低年龄性别比计算,仅因胎儿性别选择流产的女胎,就将使本应在1991-2000年出生的女婴至少短缺800多万。此间年均女婴短缺量,不仅远高于1984-1990年而且还是它的2.7倍。即便如此,低年龄人口存在的严重瞒漏报问题也仍未考虑在内,否则,女婴将至少短缺1100多万。2001-2004年,估计短缺女婴约为500万。因此,1984-2004年总计短缺的女婴最多约为1800万。虽然少数亚洲国家及地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但持续20年尚未止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其时间之长、失调程度之高,仍可谓世界之最,举世罕见。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婚配调节只是一系列调节机制中的一环,仅此环节调节欠畅,还不足以断定必对全局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婚配调节总是受所处经济社会发展

阶段的婚配观念所制约，而影响婚配观念的诸因素作用力大小，又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有所不同。显然，婚配调节决不单纯只是一个男女数量问题。伴随城镇化进程及择偶条件变化，最终无偶可择的必是综合素质较差的那部分男性人群，而该人群恰恰又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主要诱因。因此，近期的出生性别比失调，终归是导致其婚配年龄性别比失调及相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 四、解放思想、正确引导，稳定低生育水平、力促出生性别比复归正常

1984年7月，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结合人口控制与政策执行效果，马瀛通、张晓彤在写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研究报告《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全文印中央书记处会议参阅文件[1984]21号。胡耀帮同志批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是我们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中指出：紧缩生育政策，“其实欲速则不达，人口过程，是一个惯性极大的变化过程，在中国一个人口周期约七十年，我们不能幻想把多年造成的人口失误在短短十来年内调整过来，那样将带来更多、更大、更难以解决的新的的人口问题。”20年过去了，计划生育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已成既定事实而无法改变的20年出生性别比失调，就是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在现科技条件下，对偏紧生育政策；对在土地与宅基地问题上，只分配男不分配女；对在财产继承问题上，有法不依，女性权利实际被剥夺；尤其对在相关社会保障问题上，农村与城镇根本无法相比等，综合做出的相

应反映及印证，就是带来的新人口问题。

1980年起，若继续实施“晚、稀、少”政策，一直呈下降趋势的生育率，即使在20年间没有丝毫下降，人口在2000年末也将控制在13亿以内；若仅在城镇抽紧政策，并考虑政策的进一步落实与生育率的下降，人口在2000年末可控制在12亿左右，即较实际将减少六千万左右。“紧缩”政策，导致花费了远超出10年的代价，才使生育水平初步得以恢复。几乎耗费了近20年的代价，才在出生性别比重度失调代价下出现了转机，继续1980年的生育水平下降。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计划生育史上的一大憾事。然而，即使这样，计划生育成效相对来说仍是显著的，只是不幸地多走了一段不小的弯路，否则，成效要远比今天大。过去的一切虽成历史，但以史为鉴研究问题，这对遵循科学发展观转变人口控制方式，进一步做好21世纪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在中国城乡差异、南北差异与东西差异毕竟还很大的今天，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文化素质水平与生活水平都仍还不高的条件下，若采取果断措施对出生性别比失调加以纠正，“一刀切”不行，“两刀切”也不行，必须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即使这样，生育水平也在所难免地要有所回升，因为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不要让下一代人承担上一代人因过错带给他们的惩罚。须知明天的中国人口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知和努力。因此，对现低生育水平及控制能力，务必要有一个客观而清醒地认识。只有全方位地按规律或探求的

规律加以实践，才能说是坚持了科学的发展观，才能在努力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实事求是地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人口环境落到实处。

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重度失调的三大要素：一是保留男胎流产女胎的胎儿性别检测；二是胎儿性别检测下的男性偏好；三是胎儿性别检测下的多数农村地区偏紧生育政策。其解决既要从三大要素中的问题入手，也要从跟踪监管方面入手。

毛泽东同志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指出：“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计划生育工作，只有建立在“三个代表”本质要求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基础上，才能切实做到相信群众，为群众所信任；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稳定低生育水平、抑制生育上的性别偏好；才能重新审视虚假数字下制定的地方法规可行度。因此建议：各地从实际出发，在提倡生育一孩、多数农村地区最多生育两孩，以及严禁生育多孩（少数民族地区除外）下，缓和有序地分步建立宽严适度的政策与法规，以解决多数农村地区突出的法不责众问题。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总揽全局，才能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时刻把群众的权益与冷暖放心上，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及后顾之忧，改革一切与科学发展观不相宜的人口控制方式，尽力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这样才能把国家人口计生委提出的计划生育工作者要做最可爱的人，这一体现党中央指导思想的全新理念落到实处，切实步入与时俱进的轨道。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把重点转移到提高人口素

质上来的基础上，实现人口控制方式的转变，稳定低生育水平；才能对 B 超仪的操作管理和对孕妇的跟踪监管服务，形成强大社会舆论，大家都来参与的局面。人为干扰胎儿性别问题才会很少发生或不发生。失调的出生性别比才会尽早复归正常，否则，那是不行的。

## 企业男女领导者优势有别

《中国企业家杂志》“企业领导者的性别差异”调查结果显示：与男性相比，身居企业高层的女性更擅长解决实际问题，而男性更善于预测未来

从公司的董事会上到谈判桌前，越来越多女性的出现已经打破了男性在商业领域的垄断，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作为商业社会中曾经的绝对统治者，男性如何评价今天闯入其中的女性企业领导者，而女性又将如何适应一个原本只属于男性的商业世界？

针对“企业领导者的性别差异”这个问题，《中国企业家》杂志近期分别对男性和女性企业领导者进行了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作为企业领导者，男性更喜欢思考未来，而女性则更加务实。从男女企业家彼此的评价来看，男性对女性的评价要低于女性对男性的评价，而且女性在从事企业领导工作中显得不够自信。

男性眼中的女企业家：敬业但缺乏远见

女性眼中的男企业家：竞争力强但诚信不足

对于女性企业家而言，她们让男性同行最佩服的地方就是她们的“敬业精神”。根据此次调查的结果显示，

在一个包括了与企业管理有关的“19项能力/素质”，满分为7分的打分中，男企业家为女企业家打出的最高分就是“敬业精神”，得分为5.714分，而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是“诚信度”以及“公关能力”，得分分别为5.429分和5.389分。

而在女企业家眼中，男企业家身上最优秀的“能力/素质”就是他们的“竞争能力”，女企业家为其打出了5.886的高分，其次就是“远见与洞察力”和“敬业精神”，得分分别为5.706分和5.629分。

比较男女企业家得分情况，女企业家“远见以及洞察力”方面的能力比较欠缺。这一项的得分上，女性明显低于男性，仅得到3.471分，是男企业家给女企业家打出的最低分。而根据女企业家的评价，男企业家在对未来的预见上，能力明显强于女性，比较女企业家为男企业家打出的5.706分，比女企业家得分高出2.235分，是男女企业家得分中差距最大的一项。但与女企业家相比，男企业家稍显诚信不足，在“诚信度”这一项上，女企业家的得分是5.429分，而男企业家只得到4.914分，低了0.514分，是男企业家与女企业家得分差距最大的一项。

根据打分的结果，在所有“19项能力/素质”评价中，男女企业家得分差距最小的就是“理财能力”，其中男企业家得到5.088分，而女企业家得到5.083分，仅相差0.005分。

在女企业家看来，男企业家的“人事管理”以及“沟通”的能力相对较弱，在这两项上，女企业家仅为男企业家打出4.657分和4.771分，分别排在男企业家得分的倒数第一和第二位。而女企业家的最低得分，除了“远